

“枫叶”飘落在台湾

朱枫之子朱明讲述母亲的“红色足迹”

驻京记者 于明山

无名英雄纪念馆上只有四座雕像,其中就有朱枫,足见其功勋卓绝。

朱枫如何投身革命?又是如何牺牲?这位名门闺秀的身上充满传奇色彩。得知朱枫烈士的儿子朱明现居南京,记者前去采访,听朱明讲述母亲当年的“红色足迹”。

传奇人生

1905年,朱枫生于宁波府镇海县的朱家花园,原名贻荫,父亲曾是清末民初有名的富商。朱枫自幼生长在深宅大院,性格忠厚娴静,她在姊妹中排行第四,被称为“四阿姐”。

朱枫十七八岁时,在宁波女子师范学校求学,并跟随书法大师沙孟海学书法,写的蝇头小楷很有功底。朱明说,“母亲后来参加革命,与她的求学经历有关。当时她所在学校校长就是中共地下党员,解放前曾任南京中共地委书记的陈修良则是她的好朋友。”1925年“五卅”惨案发生,朱枫带头上街游行,性格中勇敢、刚毅的一面初步显现。

1927年,朱枫远嫁沈阳,成为时任奉天兵工厂总工程师陈傅良的续弦夫人,并生下女儿朱晓枫。陈傅良前妻去世后留下的两子两女,也与朱枫感情甚笃。1932年夏,陈傅良病故,朱枫带着孩子们在镇海娘家孀居。

动荡的时局打破平静的岁月。1937年,朱枫与共产党员朱晓光相爱结婚。“七七事变”后,夫妻二人毅然投身抗日救亡洪流,离开富裕家庭辗转于武汉、桂林、上海等地,在中共领导下,从事文化及财经工作。1945年2月,身经百战的富家小姐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。

沪上春秋

“母亲一生与上海有很深的渊源,留下多处足迹。”朱明告诉记者,在上海期间,母亲从一个为革命效力的经济工作者,锻炼成为成熟干练的地下工作者,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1951年华东局组织部批准朱枫为革命烈士,上海市人民政府颁发证书。

黄河路——“同丰行” 1944年,朱枫在上海黄河路租借一幢房子,筹备同丰行。上海新书店混进投靠汪伪的内奸,遭受很大破坏,大部分人被捕。在沪西日本宪兵队严酷审讯中,朱枫经受住考验。出狱后,不顾个人安危,从被日伪查封的书店后面的小气窗爬进同丰行,找到被查封的现金、支票、账册等重要物品,然后悄悄爬出。被敌人发现必死无疑,连替她放哨的友人都是分秒提着心,吊着胆。

金陵东路12号——“建华贸易公司” 1946年,在华中局做情报工作的徐雪寒接受组织委派,回到上海筹建一批公开合法的企业。建华贸易公司的办公地点在金陵东路12号楼上,后来该公司扩大业务,改组为联丰花纱布公司。为打开销路,朱枫带领供销



■ 1949年8月送儿子回大陆前在香港与儿子朱明侄子朱辉合影 (朱明提供)



■ 1950年6月,朱枫被押至台北马场町刑场英勇就义 (资料图片)



■ 烈士朱枫60多年后魂归故里 (资料图片)

人员跑市场,以低价购进白坯布,染成市面畅销的阴丹士林布,再打上联丰牌子出售,很受顾客欢迎,生意也兴旺起来,“联丰”在竞争激烈的上海市场站稳了脚跟。

南京路与四川路交汇口——“鼎元钱庄” 抗战胜利后,“鼎元钱庄”在上海闹市区开张营业,直至上海解放。鼎元钱庄通过票据交换、汇兑等金融业务,为解放区与国统区之间转汇款项,打击国民党的经济封锁,进行货币斗争。鼎元钱庄还直接为解放区采购军用物资,设法运到解放区。

朱枫是公方代表并负责财务,还是党组织指定的联系人。鼎元钱庄的总经理徐振东是位爱国民主人士,在朱枫等人的教育和影响下,徐振东利用同政营中人打交道的机会搜集情报。

长乐路——居住地 朱枫当年在蒲石路(今长乐路)紧靠瑞金路的一排西式洋楼,租了楼上一间房,接待革命战友,从事地下工作。朱枫负责保管上海地下党情报部门的经费,还负责几家公司的资金,但生活相当俭朴。因公司业务和情报工作的关系,与商界、政界人物都有接触,有时穿得像阔太太,但更多时候跟上海弄堂里的娘姨差不多。

深入虎穴

1949年11月25日,朱枫从香港维多利亚码头登上开往台湾基隆的海轮,她的身份是中共华东局情报部派遣的“秘密特派员”。身上藏着组织开出的两封介绍信,一封给中共台湾省工委书记蔡孝乾,另一封是给

“密使一号”国民党“国防部参谋次长”吴石。衣服夹层,还藏着金项链和金镯。

朱枫这次赴台,是以探望养女阿菊为名,化名李琴云,住在养女家中,秘密开展工作。

潜伏期间,朱枫出生入死,前后7次与吴石秘密会面,成功将《台湾战区战略防御图》、各防区的《敌我态势图》等重要情报,送到了中共手中。

任务完成,朱枫满怀胜利的喜悦准备与家人团聚,命运却发生急转。蔡孝乾被捕叛变,吴石在最危急的时刻签发了“特别通行证”,让朱枫搭乘一架军用运输机飞往舟山(当时还未解放)。

1950年2月18日,朱枫在离家乡宁波不远的定海被捕。被羁押时,她舍生取义,从衣服里取出金项链、金镯,分4次把二两多重的金子吞下,但被救活。

狱中朱枫并未遭受严刑拷打。朱明说,“母亲家里很多亲戚是国民党,还有的是富商。蒋介石特别指示对我母亲不动刑,他觉得像我母亲这样的人意志不会很坚定。蒋经国还曾对母亲说,大家都是宁波同乡,只要愿意投降就可免于死。”但朱枫毫不动摇,4个月后,慷慨就义。

在后来公开的史料中,主办“吴石案”的保密局在“对本案之综合检讨”记录中写道:朱匪勾企企图自杀,证明其对应付事变,早作准备;匪(指朱枫)干此种维护重要工作,不惜牺牲个人生命之纪律与精神,诚有可取法之处……可见,朱枫在生死关头的英勇表现,让敌人也大为叹服。

朱枫又名朱湛之,除了中共地下党身份,她还是一名贤惠的妻子,两个孩子的母亲。“为了革命,一家四口从没合家团聚过。”朱枫之子朱明说。

1948年夏,朱枫奉命前往香港,继续从事地下工作。1949年获准离港与久别的丈夫团聚。她先行将带在身边的朱明和堂兄朱辉送回大陆,临别时还特意与小哥俩合照留念。在轮船码头叮嘱朱明说,“告诉爸爸,妈妈很快也能回家了。”分离多年的一家人就要团聚,朱枫却接到新任务。当年解放台湾箭在弦上,急需派人入台与台湾地下党取得联系,经验丰富且在台湾有社会关系的朱枫成为最理想人选。朱枫毫不犹豫地接受了任务,并给丈夫写了一封难懂的家书,“兄将外出经商,此去将有数月逗留,妹不必惦记,也不必和他人说起。个人的事情暂勿放在心上,更重要的应该去做,几个月后,兄将以更愉快的心情与妹相见……”

朱明给记者看一张很珍贵的照片。朱枫身穿浅色短袖旗袍,眼含笑意,坐在一张铺着方格台布的茶几旁,看上去就是位温柔又多情的妻子。与其他老照片不同,背后还有一行字:她已深深体验着:“真实的爱”与“伟大的感情”,从此,将永远快乐而健康!1949年10月25日。

完成在台任务,终于又可以回家。1950年1月,朱枫托朋友捎了张便条给上海的亲人,写着:风将于月内返里。多年不见想念弥殷,得此可增快慰也。

没想到这封信竟成朱枫绝笔,回家约定竟成永别。朱明至今仍清楚地记得知道母亲牺牲消息时的情形。“1950年6月,时任华东贸易部部长的徐雪寒来我家,和父亲在小屋里密谈。不一会儿,父亲走出来,表情非常沉重,只说了一句话,母亲牺牲了,很英勇。”

母亲遗骸放在何处,一直是朱明心中无法释怀的牵挂。“母亲牺牲后,每年到她的生辰,忌日我们都会纪念她。”朱明说。母亲的骨灰下落不明,1983年,朱明与父亲朱晓光在明孝陵宝顶山上,为母亲建了一个衣冠冢,以寄托哀思。

2000年,山东画报出版社《老照片》上刊登了一组照片,但见朱枫着碎花旗袍,外罩深色毛衣,紧握拳头,目光镇定。此时,她正面临着敌人的最后判决。朱枫的女儿从来没有想到,母亲是以这样壮烈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。这些照片的出现,让他们更迫切希望找到母亲的遗骸。

几经周折,朱枫之女朱晓枫联系到照片的发现者台湾著名学者徐宗懋。2003年起,徐宗懋在台湾帮助寻找朱枫遗骨的下落,但均无进展。2009年12月,宜兴人潘某赴台寻找失踪的父亲,在辛亥第二殡仪馆提供的一份名册中,发现了“朱湛文”的名字。2010年5月,公墓人员对殡仪馆上百个无主骨灰袋进行翻检,在角落里找到了“朱湛文”名字的骨灰坛。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的朱滢源教授以研究近代史的名义,进入一般人难进的领域,证实“湛”和“之”都是连笔,被登记人员误写成“湛文”

因朱枫特殊的身份和背景,寻回并不容易。经过繁琐的程序和若干机构、个人的帮助,2010年12月,朱枫终于“回家”,这一路“走”了60多年。2011年7月,朱枫的骨灰由北京包机送回宁波,安葬在故乡——宁波镇海革命烈士陵园。飘零了半个多世纪,朱枫终于在她渴望的土地上得到安息。

驻京记者 于明山

红色女特派员回家路『走』了六十多年

(上接 A14 版)

叛徒生活腐化变节

有英勇不屈,也有变节叛变,最令人想不到的是蔡孝乾叛变。

1946年蔡孝乾被中共中央派遣到台湾,就同小姨子住在一起。小姨子是个十六七岁的苏州姑娘,两人虽以“兄妹”身份同居,但一个中年男人与一个妙龄少女“形影不离”,给日后国民党搜捕留下线索。

1949年7月,以毛人凤为首的保密局掌握了“老郑”(蔡孝乾)的线索,一直蹲守的特务抓到一名40岁来的男子。此人报了名字和身份后,要求提供美食。特务头子谷正文后来回忆说,一眼看出此人追求享乐的弱点,便天

天给他买饺子。一周后此人说“想着牛排的味道都快想疯了”,并指定要到台北最高档的波丽露餐厅买,吃完后伺机逃脱。

“老郑”逃走,谷正文发现他正是台湾中共地下党最高负责人蔡孝乾。掌握蔡孝乾躲到嘉义农村的消息,派特务前去查找。为避免显眼,特务们换上农民服装,到当地后在乡间路上看到一个穿西装的人,追上去一看正是“老郑”。经查问,原来他在乡下躲藏两月清苦难耐,想到镇上西餐馆解馋,却全然不顾着装上的大忌。蔡孝乾第二次被捕后马上叛变,愿交待所有地下组织,只提出一个条件,就是让小姨子来监狱同住。

谷正文撰文回忆,“蔡孝乾久经中共长征及对抗战,吃尽苦头,故返台后即生活腐化,思想动摇”,道出了蔡孝乾从胸怀远大的

革命者堕落为可耻叛徒的主观“动因”。他感叹:如果共产党派来台湾领导地下党的人,能有周恩来或者罗荣桓的才气,国共在台湾这页隐蔽战线斗争史恐怕要改写。

若授勋应先给他们

寒风习习,仍有市民前来参观瞻仰,记者看到有位老人正在英雄塑像下摆放鲜花。老人说,英雄是有名的,做的是“无名英雄”。来鞠个躬、敬个礼,告诉他们:你们的鲜血没有白流,我们永远同在。

毛泽东对我党隐蔽战线上的无名英雄们曾给予高度赞誉,他说,以后解放了,若授勋,首先应该授予他们。

1961年,李克农向中央建议,“拟将党中央特别委员会斗争历史尽可能加以搜集,汇

编成册,以利于中组部和军委参考,同时也可以使过去在斗争中的无名英雄死有所安,老有所归,幼有所寄,鳏寡孤独,各得其所。”

六十四年弹指一挥间。当年笼罩海峡上空的炮火硝烟已散去,两岸“三通”开启了两岸关系大交流、大合作、大发展、大融合的历史新篇章。“修建无名英雄纪念馆,纪念在台湾牺牲的隐蔽战线烈士,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”。国防大学教授公方彬表示,它可以让思念英雄的人感动,也让牺牲者的后人获得精神上的抚慰。

冬日暖阳下,英雄塑像前的鲜花尽情开放。石上之名,传奇之魂。所创伟绩,既无人知,亦永不遗忘。更多的英雄,他们的名字不被世人所知晓,更没有刻在纪念碑上,但是共和国会永远记住他们。